

促进中非关系发展的建议

阎学通 刘月明

冷战后中非政治上的相互需求增加,

但国际政治合作的范围有限

冷战的结束使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增加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关系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比较冷淡。1989年下半年起,中非政治关系开始向积极方面发展,1990年双方政治关系转热。1990年非洲有9位国家首脑访华,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国家达26个,目前,中非关系在往来级别和频繁程度上都在增加。

冷战后中非政治关系不断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双方的相互需求和共同利益增加了。由于美苏结束了在非洲的争夺,非洲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变得更无足轻重,获得经济援助的机会大减。外部支持消失,世界性政治自由化的泛滥使非洲国家政治内乱四起。为了摆脱这种被边缘化的处境,稳定国内政局,非洲国家政治上需要中国对现政权的支持,经济上寻求中国援助,外交上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多为第三世界的利益说话。中国与非洲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干涉内部事务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即抵制西方以人权为由干涉内政。在联合国第49届人权会议上,以22票对17票通过我国提出的对西方反华决议草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其中赞成票的一半是非洲国家。

虽然目前中非之间的共同政治利益有所增加,但中非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合作领域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人权和不干涉内政问题上。由于非洲国家都是小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利益与我不一致。他们希望大小国家能够平等,削弱大国的特殊利益,例如取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他们希望增加第三世界在安理会的成员,有非洲自己的代表成为常任理事国,这会削弱我在安理会中的地位。由于我与非洲国家缺少地缘联系,在安全、地区合作、环境保护等方面缺少共同关心的具体事务。

非洲国家与我关系紧密的不多。在国际事务中能经常保持与我立场一致的非洲国家只有津巴布韦等少数国家,其它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与我国的关系仅是一般的国家关系。冷战后失去了利用美苏矛盾获取经援的条件后,一些非洲国家开始对我打台湾牌,对我提出较高的经

日本海,有着天然的与外界交流的条件。通过中国境内的铁路和蒙古新铁路线可达俄罗斯的赤塔,而形成又一个欧亚大陆桥。近年来,图们江三角洲开发的价值为中外经济学家所洞察,并逐渐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1992年10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主持下,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的高级政府官员在北京签署了一份有关图们江地区开发的协议。预计这项20年的发展计划将耗资300亿美元。

图们江三角洲的开发是包括中俄两国在内的多国经济合作项目,是一项跨世纪的宏大工程。工程的实施将使该地区繁荣起来,并对东北亚各国的发展带来裨益。

〔责任编辑 阎 瑾〕

援要求。由于我们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有些非洲国家转向了台湾。近年来已有利比里亚、尼日尔、几内亚比绍、莱索托、中非共和国等5国与台湾“建交”。还有赞比亚、赤道几内亚、马达加斯加等国发生过这种危机。目前台湾当局把重返联合国定为主要外交目标,今后必然会加紧在非洲的金钱外交,而非洲国家也会对我更多地打台湾牌。

冷战后中非经济合作有所发展,但发展十分缓慢

1983年我提出对非经济合作四原则后,中非经济关系由单方援助转向互利合作。1989年后这种合作继续发展,1986年至1991年中非贸易额由9.5亿美元增至14.26亿美元。合作的形式现有承包工程、劳动服务、技术服务、人员培训、独资或合资经营、合作管理、租赁等。

相对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总体平均发展速度,中非经济合作发展缓慢。1989年至1991年我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65%,而对非只增长49%,其间还出现过负增长年份。从比例上看我对非贸易占我国国际贸易的比重较低,1989年以来一直徘徊在1%左右。我对非贸易占非洲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很低,也只有1%左右,而且还有长期的赤字。

我与非洲国家经贸关系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我没有抓住非洲的主要市场。非洲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家是由南非、尼日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构成,它们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56%。而我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只分别占他们外贸的0.27%、0.3%、1%和0.6%。其次是我贸易方式僵硬。起订量高,付款方式不灵活,运输期长。第三是缺乏宣传。我对非洲国家宣传我产品的工作不够,非洲人还不很了解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对中国产品信不过。第四,我国厂商认为非洲国家经济落后,不注重开发非洲市场。第五是非洲的产品不适合我国需要,进口量难以增加。

政策建议

鉴于我在非洲的经济利益有限,对非政策的任务应侧重发展中非之间的政治关系。争取非洲国家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抵制台湾在非洲的金钱外交应成为我对非政策的主要目标。台湾的外汇储备是我的一倍,人均量是我的108倍,所以我不能、也不应该在非洲与台湾进行援助竞赛。为了挫败台湾的金钱外交,我在非洲应采取保护重点的作法。非洲小国多,他们在国际政治中作用很小。如果那些1000万人口以下的小国对我打台湾牌,我应对他们晓以大义,而不增加额外援助。台湾以美元收买非洲国家的能力也有极限,每收买一个外交关系,台湾就背上一个定期援助的包袱,一旦停止援助,这些小国会立即转向我。对3000万人口以上的尼日利亚、埃及要努力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和南非要尽力保持友好关系。这些国家在国际上,特别是在非洲影响大,如能与这些国家建立较好的关系,必然能带动与他们周边小国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与南非发展较好关系,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就容易重新与我复交和建交,因为他们都在南非的控制下。对1000万和3000万之间的国家可分为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国家和影响不大的国家两类。像肯尼亚、科特迪瓦、摩洛哥这种国家要充分重视,而赞比亚、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之类则适可而止。在坚持保住与非洲大国外交关系的原则下,我应注重普遍加强与非洲国家上层社会人士的关系。非洲国家多为人治国家,社会腐败比较严重,政府官员个人意见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很大。我对非经援的一部分如用于发展与非洲上层人士的个人关系,其政治效果会比用于社会项目更为有效。台湾于1993年1月发表了《外交报告书》,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为了使非洲国家更加明了我国的台湾政策,我国

关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应尽早面世。

在继续支持非洲国家反对西方对内政干涉的同时,也应肯定非洲国家多党政治变化的积极性。由于多党运动在非洲国家的普遍发展,许多新的非洲领导人都是通过多党选举结果上台的,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非洲国家通过选举产生新政府。承认多党政治在非洲的积极性,就是承认通过选举上台的政权的合法性和进步性,这有助于与新执政者建立友好关系,而且为今后发展与新政权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承认多党运动的积极性,也为我与反对党往来创造了理论基础,从而可以减少非洲国家因政权更迭对我采取不友好政策的可能。

采取更多的形式扩大我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实力不足是我在非洲影响有限的根本原因,但扩大影响的方法不够全面也是原因之一。除了继续加强对非派遣医疗队、文艺代表团、领导人访问和接收非洲留学生之外,还可以做以下几方面的尝试:鼓励我在非外交、工程、医疗人员走入非洲社会,如他们愿意向非洲移民提供方便条件。增加对非洲无线广播的语种和时间,非洲有几百种语言,许多人不懂官方语言;重点在于介绍中国经济的成就、科技发展、优秀文化和产品广告。鉴于非洲人喜欢中国的武打片,应加强中国电影和画报的发行;现留学回国人员日益增加,可派遣有语言能力的人去非洲从事教学,教学是最有效的宣传方式。

发展中非经济关系的重点应放在扩大出口和技术援助上。扩大出口既可有经济收益,又可扩大政治影响,对非技术援助则是我国的长处,成本低,影响大,效果长久。在非洲建立货物集散中心已成为扩大对非出口的当务之急。南非、科特迪瓦、摩洛哥、肯尼亚的政治影响较大,基础设施条件较好,而且都有较大的港口,如果我在这四个国家建成集散中心,并附设中国银行办事处,可从东、南、西、北四面向非洲大部分地区辐射。国内产品先集中到这四个国家便于非洲国家提货,订货量大小的生意都能做,现款和易货贸易也都能做,从而可以解决起订量大、运输期长、付款方式不灵活三个主要问题。同时在贸易上要加强与当地华人的合作,而不应与他们争生意。

对非出口要发挥我技术优势。我国对非出口目前主要是日用品,而机械和工具出口量不大。其实非洲国家更需要我机械制品和工具,我国机械与工具虽不如西方的先进,但具有操作简单,易于维修的特点,这比较符合技术落后的非洲国家的需要。近年来非洲国家已意识到中国技术更符合非洲国情的情况,尤其是农业技术。许多知识分子正在推动政府加强转向学习中国的传统技术,从做豆腐、种菜到打井、灌溉对非洲都有吸引力。向非洲国家传授我国普通生产技术必然会带动我机械产品和工具的出口。

向非洲派遣技术专家是发展中非经济关系的重要渠道。非洲国家现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我应主动和他们商讨派遣经济和技术专家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改革经验为世界所公认,非洲国家领导人很想学习中国经验。我应派一些专家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帮助他们建立经济实验区。由我国专家制定的计划不但有助于我国产品的出口,而更重要的是可以长远地影响中非经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苏联50年代对我派出了专家团至今对中苏经济关系还有影响。

此外,我可积极鼓励我企业和个体户到非洲发展我传统产业。利用当地原材料发展手工编制品、建材加工厂、家具厂、制砖厂、木雕艺术加工厂等。这些项目投资少,规模小,见效快。不但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就业问题,发展生产力,同时也是扩大我国出口的一条途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周边国家和西欧出口。(1993年7月稿)

〔责任编辑 谭秀英〕